

本文引用: 许盈, 葛金文. 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的类型与特点述略[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1): 158-162.

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的类型与特点述略

许盈^{1,2}, 葛金文^{3*}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长沙 410208; 2. 湖南省马王堆医学研究中心, 湖南长沙 410006;
3.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 湖湘中医药文献既是湖湘先人认识疾病的重要途径, 又是湖湘地区中医药知识的重要宝库。从早期的口头传承到简帛、竹木简牍, 再到纸质文献, 湖湘中医药文献呈现了丰富多样的类型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周秦两汉时期, 湖湘中医药文献开始萌芽, 主要以简帛文献为主; 魏晋隋唐时期, 文献载体逐渐向竹木简牍转变, 且养生文献得到发展; 宋金元时期, 方书集合文献占据主导地位, 中医药知识体系更趋完善; 明清时期, 见证了湖湘中医药文献的鼎盛, 特别是处理时疫的文献得到广泛流传。通过厘清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的类型与特点, 展示和挖掘湖湘中医药知识和理论的构建历程, 从而促进湖湘中医药及其文献的研究利用。

〔关键词〕 湖湘文化; 中医药文献; 文献载体; 文献类型; 地域医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4.01.025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Huxiang TCM literature

XU Ying^{1,2}, GE Jinwen^{3*}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Hunan Mawangdui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3. Hunan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Abstract〕 TCM literature of Hunan region,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Huxiang TCM literature, serves as both a crucial pathway for Huxiang ancestors to understand diseases and an important treasure house of TCM knowledge in Huxiang area. From initial oral inheritance to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nd then to paper documents, Huxiang TCM literature has fully demonstrated its richness and variety as well as its uniqu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Huxiang TCM literature began to sprout during the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Later, in the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literature carrier gradually changed to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ccompanying the growth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health preservation.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compiled formula books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marking the ever-improving TCM knowledge system. Th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nessed the heyday of Huxiang TCM literature, especially with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on dealing with epidemics. By clarifying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Huxiang TCM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eal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uxiang TCM knowledge and its theo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Huxiang TCM and its associated literature.

〔Keywords〕 Huxiang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literature carrier; literature type; regional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23-09-0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JJ225997); 湖南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重点项目(S2023XJZD04);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958)。

〔通信作者〕* 葛金文,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40831556@qq.com。

湖湘地区是中医药卫生经验知识积累较早,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地区之一。距今50万年前的津市虎爪山遗址,是湖湘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1]。先民经过不断的探索、总结与创新传承,逐渐形成“神、巫、药兼融”的远古原生态中医药文化。史前时期,“荆蛮”即现湖南境内的先民医疗几乎完全依赖于苗医苗药。但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中医药相关的记述主要以非文字的形式,如以神话、传说等口传心授的“口碑文献”保存其中医药经验。湖湘中医药文献的文字开端始自周秦两汉时期,以下从周秦两汉时期、魏晋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四个阶段发掘探析不同类型湖湘中医药文献的内容形式、特点与价值。

1 周秦两汉:湖湘中医药文献启源时期

1.1 以简帛为流行载体的中医药文献

周秦两汉时期是湖湘中医药文献的萌芽时期。楚人入湘传输楚国文字与文献,正式开启湖湘的文字时代。楚人入湘的主要进展发生在春秋中期偏后期的时间段内,据此推论,见于文字的湖湘中医药文献,理论上最早可能诞生于春秋后期。

竹简木牍是先秦时期湖湘地区最主要的中医药文献载体,湖湘最早的中医药简牍文献产生在战国时期。在湘西龙山县发现的里耶秦简不仅保存了战国时期的医药文献,还填补了秦朝医药文献的空白。2002年里耶古城发掘出38 000余枚秦简,已公布的77枚简牍涉及秦朝洞庭郡迁陵县衙署设立医官、百姓疾病、医政管理、处方、服用方法、中药材种植等丰富的中医学内容^[2]。其中关于秦始皇求仙药诏令、地方献药、疾病及疗效等记载,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疾病防治、健康养生的理念和实践经验,彰显了湖湘医学发展的高度^[3]。该时期湖南出土有关医方和食方的简牍尚有沅陵虎溪山西汉简^[4]、张家界古人提东汉简^[5]等。

简牍流行的同时,缣帛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医药文献载体存在。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14种,绝大多数是战国中后期至秦初人写成的,编写体例不同,内容独立,整体上基本首尾完整。《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10种古医书合抄在5张长帛上,涉及方剂、经脉、养生等中医药内容,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古方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为《黄帝内经》等经脉体

系的构建提供了直系祖本;《导引图》帛画上绘44人做各式运动姿态,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健身图谱。

1.2 中医史上临床类、本草类文献的开端

张仲景为东汉末年人,对这一时期湖湘中医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唐代甘伯宗《名医录》记载,张仲景“官至长沙太守”,据历代医籍、地方志和古迹的记载可以明确张仲景曾任职长沙太守^[6]。长沙是张仲景的行医坐堂地,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共经历了4个冷暖变化时期,东汉末年为第二个寒冷期^[7]。寒冷的气候裹挟战乱纷争的社会局势,由此加剧了疫病的大规模流行。为了应对环境与病机的变化,张仲景超越医经、经方学派框架,摒除“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医风,关注病因重在伤寒。所谓《伤寒论·伤寒例》云:“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诊疗贴合临床实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法则。《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临床医学文献的开端。仲景学说作为湖湘地域医学鲜明标志,经梳理,自宋代以来,湖湘医家有关《伤寒杂病论》的著作有35种。湖湘医学与伤寒学说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该书的版本研究与注释、临床运用中,形成了医必切实、注重临床的独具特色的湖湘伤寒学说^[8],展现了湖湘地域历史医脉的延续。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文献《神农本草经》,其成书之时正处于湖湘地区历史传统文化与医药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张登本对文献资料进行细致检索后指出,本草知识著作托名于“神农”不单是一种托辞,而是有实质性的历史根据与史料支撑。相传,炎帝为“宣药疗疾”,爬山涉水,晚年采药来到三湘大地,他不仅是中药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湖湘地区传统医学知识的采集者与传播者^[9]。他在三湘大地上亲身实践,尝试和验证各种药材,为本草药性的分类提供了原始的经验数据。特别是宋代罗泌《路史·后记》记载炎帝葬址“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即现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炎帝陵),将《神农本草经》与湖湘地域文化紧密相连,提供了地理与历史上的坐标。在东汉时期对神农氏采药经历与药理学知识的整理加工,最终凝结为《神农本草经》这一文献著作。该书不仅是湖湘中药学之滥觞,也是祖国中医药学之始,至今仍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 魏晋隋唐五代时期:湖湘中医药文献奠基时期

2.1 三国魏晋时期竹木简牍仍为主要实物载体,养生文献惜无传世

三国魏晋时期,于湖南而言,中医药文献的主要载体仍然是竹木简牍。湖湘地区是迄今出土简牍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为完整的省份,时代涉及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其中以三国时期的简牍为最多^[10]。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共出土了三国孙吴时期简牍14万余枚,文字200余万,成为20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室文书、西北屯戍简牍之后出土文献的又一重大发现。其最后一卷《竹木牍》分上下两册,有几件文书涉及孙吴时期的疾疫和医疗,其收录内容包括疾患死亡报告、医疗养护、时气疫疾、医事与医政^[11]。虽然残损较多,却是具有历史价值与参考价值的研究医疗制度、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文献。有学者根据目前出土的医学文献将简帛医学流派大致分为荆楚医派和扁鹊医派两个医学流派^[12]。三国两晋时期与周秦两汉时期的简帛医书及其思想,以湖湘地域历史地理基础或特定文化氛围为基础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独特中医药理论主张、方法或技艺,由此成为荆楚医派的主体。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杂糅的新时期。魏晋时期时政动荡,士大夫越名教而任自然,清谈避祸的同时,多寄意养生,诚如范文澜所言:“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士人或留意搜集医方,或探究本草药性,或推崇服石炼丹,湖湘地区有许旌阳、葛玄两位医家的相关记载。《石门县志·方技》记许旌阳“炼丹方顶山,其铺毡处,草色皆赤。山前有祠,手植银杏双株,尚存”。^[13]另一位“太极葛仙翁”葛玄也曾在湖湘境内修习丹道:“稚川以祖也,吴人。石门北二十里,石屋修炼,寻以丹术授弟子郑隐,尽得其诀,至今山名葛仙。”^[14]据《云笈七签·灵宝略纪》提到的师承关系脉络,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所习修道炼丹之术从叔祖葛玄而来。许旌阳、葛玄的医术除方志有载之外,而不见于医著,故此时期的湖湘医家尚无传世中医药文献可考,葛洪所著《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可视为存录师者医学养生思想的文献资料。

2.2 隋唐时期零散医学篇章散见于综合性著作,湖湘方书特色显山露水

从传播形式来划分,古代中医药文献可分为独立文献和集合文献。零散医学篇章面貌的独立文献

是中医药文献的最基本形式,也是医学专著出现的前提。医家决定医著,得力于该时期的科举制度。湖南产生了第一批进士,出现了称著于时的医家,如唐懿宗时期郴州韩宗绍曾任皇室待诏、翰林医官。但人才规模与邻省及进士较多的北方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湘人著述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文献不见任何湖湘地区成型的医学专著,而主要以零散篇章的形式散见于综合性著作。典型的实物为长沙人欧阳询主编的类书《艺文类聚》,该书保存了大量隋唐以前的珍贵医学史料,其中“方术部”分为养生、卜筮、相、疾、医等5个子目,“药香草部”共收载药物43种^[15]。

该时期湖南著作除集部有医学图书收录,其他各部类图书或缺乏或稀少,湖南中医药文献发展与中原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但湖南成为道教和南禅宗的腹地,湖湘中医药文献地域特色逐渐显现。据《宝庆府志》《药王孙思邈与龙山》等记载,“唐时孙真人修炼于此”(龙山岳平顶寺),孙思邈长期居住龙山采药、医病、著方,《备急千金要方》即编撰于此。该书共30卷,合方论5300首,其书所述避居静修、参禅调气等应对疾病的方法,流行于隋唐湖湘地区知识分子之间,搜集地方特色药物、验方的风气使得方书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湖湘医学的显学。

3 宋金元时期:湖湘中医药文献兴起时期

3.1 中医药文献兴起的宽松学术环境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6]文化、学术在宋朝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发展文官统治,宽松的学术环境为医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大为流行,官方开始雕印医家经典,医家雕印个人医著。宋代官方对医书的刊行十分重视,《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籍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整理而成为经典的定本,刊刻印行,大行于世^[17]。地方政府面对医籍刊刻的重视,自上而下起到示范的导向作用。湖南地区受到极大影响,湖南刊刻雕版印刷发端于北宋,至南宋开始兴盛,其中潭(今长沙市)、永(今永州市)、道(今道县)三者的刊刻最多^[18],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国家中心南移,湖湘地区医学、理学的兴起、传播与书院教育发展,推动湖南的思想文化领域释放巨大的活力。

3.2 集合文献方书为主导,进入传统知识分类体系

对独立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并按一定的体例重新编排形成集合文献^[19]。宋金元时期湖湘地区的中医药文献通常以编述的方式保存流传,形成了方书一类的集合文献。据统计,宋金元时期湖湘地区所留存的医著 24 部多为方书^[20],收集名方、编撰方书和刊刻方书成为当时社会的新趋向^[21],且湖湘方书大多数包含各种临床医学知识、验方、效方,流传颇广。以衡阳曾世荣所撰《活幼心书》为例,该书最早由元天历二年曾世荣自刻本刊行于世,是我国儿科文献的重要著作。从该书在明清两朝和日本的多次校本刊行来看,该书对后世的儿科学发展影响很大。

在宋金元时期,湖湘地区中医药文献以方书为主导,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湖湘传统方书源远流长,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可见一斑。此时期的湖湘名医均有影响较大的方书传世。刘元宾方剂学代表作《神巧万全书》现存 240 方,宋代医家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大医习业》云:“其如本朝《太平圣惠》《乘闲集效》《神功万全》《备见崇文》《名医别录》。”将刘元宾及其《神巧万全书》与仲景、华佗、《太平圣惠》、《名医别录》相提并论^[22]。

宋金元方书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养生科等科,方书文献体例规格也从零散的单篇发展为成型的专著。传统书目的知识分类体系不仅包含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品格,亦有强烈的“价值论心理”^[23]。官修书目及其背后的知识逻辑对医籍的收贮和归类,表明了官方意志对医学的关注和认可。隋唐时期,湖湘医籍未见载于中医药图书类目,宋金元时期方书类医籍成就突出,进入传统知识分类体系。子部医家类被归为“治世者所有事”,凸显医籍的政教价值导向。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宋代“子部医家类医书目”,图书“杂方目”,以湘乡朱佐撰《类编集验医方》15 卷为最早。朱佐搜采民间医生,尤其是湖湘医家及历代方书中的有效方剂,撰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列方近 900 首,是中医学史上成书较早、影响较大的方书之一,中国最大的方书《普济方》对该书内容多所辑录。

4 明清时期:湖湘中医药文献鼎盛时期

4.1 刻本为主要载体形式,医著骎骎始盛,流传甚广

以纸张为载体的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有抄本、刻本、写本、稿本等形式。时至明清,湖南中医药著述进入鼎盛时期,刻本成为了医籍的主要载体形式。

皮锡瑞在《师伏堂日记》中说到:“湖南人物,罕见史传……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骎骎始盛。”^[24]人才盛,著述兴。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同治以前湖南著述,虽不能反映清代湖南医学著作的全面情况,明清湖湘中医药文献繁荣可见一斑。子部医家类 114 种,其中一些医籍版本甚多,流传甚广。当中首推邵阳周学霆《三指禅》,有道光八年星沙换鹅堂刻本、咸丰十一年三让堂刻本、湖南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一年澹雅书局刻本等二十余版本。而方书方面又以清代善化人鲍相璈《验方新编》十六卷最为典型,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中国历代医书版本最多、流传最广的医书^[25],有道光二十九年广州海山仙馆刻本、咸丰元年余庆堂刻本、同治四年刻本、光绪十四年扫叶山房刻本等百余个版本,并传及日本、韩国。

清代嘉庆道光以后,湖南时疫流行,专门论述疫病病机、治法等方面的医著广为刊刻流行,其中《时疫白喉捷要》为较早使用“白喉”命名的专著之一。因治疗“白喉”的需要,全国均有对于该书的翻刻,共有光绪十一年二原堂刻本等十六个版本^[26],其余疫病医著如衡山人文起《痘科辑要》、邵阳人刘文范《羊毛瘟疫新论》、衡阳人李纪方《白喉全生集》^[27]等均有多种刻本。

4.2 坊刻为主的多种主体参与刊刻,善治时疫,内外并重

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记载:晚明以前,南京、苏州等江南一带是全国刻书的核心区域,到了清代,新的刻书中心开始向湖南、湖北迁移,“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而湘尤在鄂先”。^[28]咸丰、同治时期,藏书、刻书荟萃的江南地区遭受兵燹,市肆荡然,湖南仅为过境之地,刻书业受到的冲击较小。清代后期湖南医籍收藏、刊刻远胜前代,进入鼎盛时期,不让闽、赣、鄂及其他各省。在多种主体参与下,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医籍的刊刻数量、刊刻类别、流布传播等方面有诸多超越。

坊刻为明清时期湖湘地区医籍刊刻的主要形式,刊刻医籍数量远远超过官刻、私刻。“明代嘉靖以后,邵阳市成为江南四个半刻书城市中的半个”。^[29]自明代以来,宝庆府邵阳书坊刻书成为湖湘民间坊刻中心,刊刻医籍数量居湖南之最,又以经元堂刊刻医书数量最多。据统计,清代湖湘坊刻医书总计 363 种,官府刻书、私家群体刻书是清代医籍刊刻的重

要补充^[9]。伤寒、金匱等临床实用医著为官刻本、私刻本主要选材来源。

湘人质朴,医学被视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因此,明清时期临证各科医著得到了显著发展,尤其以治疗时疫的医籍为核心,体现出内外并重的特征。在官方层面,刊刻临床各科医籍尤其是疫病医籍,不仅丰富了医学知识体系,也可能成为湖南政府应对流行疾病的实际措施之一;对医家而言,临床实践始终以患者的真实需求为中心,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问题。根据各级地方志和各类书目所载,清代湖南地区所留存的医学著作中,临证各科医著刻印最多,共计62种。特别是在处理时疫温病和喉科疾病方面,成就斐然。时疫温病方面,湖湘诸医尤重视麻、痘二证的防治,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仅二证专著,有据可查的医著有25种。喉科诸病医学专著14种,其中以“白喉”最为险恶,湖湘医著对此病的鉴别、分型治疗有精辟的见解,浏阳人张绍修著4种治疗白喉的专著:《时疫白喉捷要》《白喉症论》《白喉时疫方论》《专治时疫白喉丹痧经验良方》。因此,湖湘医学文献在临证医著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格局,相较之下,基础理论医著的研究相对不足^[30]。

5 结语

通过以上述略可以看出,从载体形式而言,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的非纸质载体有竹木、简牍、简帛等文献类型,而以简牍为主要文献载体类型;转型为纸质载体的中医药文献则以刻本为主要载体形式。从性质和作用区分,湖湘中医药文献从零散单篇的独立文献发展为编述方式的集合文献,展示出湖湘古代中医药文献重视区域药物搜集、方书源远流长、关注时疫需求的地域医学特色。今后应加强对湖湘中医药文献内涵和价值的重视,运用多学科手段,如历史学、文献学、药学等,深入挖掘湖湘中医药文献的研究利用价值。同时,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对湖湘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保护和传承,以促进湖湘中医药的研究和应用,为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 郭伟民. 湖南史前时代的考古学观察[J]. 船山学刊, 2022(1): 89-105.

[2] 方懿林, 周祖亮. 《里耶秦简(壹)》医药资料初探[J]. 中医文献杂志, 2012, 30(6): 10-13.

[3] 谢明宏. 里耶秦简、周家台秦简、北大藏秦简所见医简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8.

[4] 郭伟民, 张春龙.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3(1): 36-55, 2, 1.

[5] 张春龙, 胡平生, 李均明. 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J]. 中国历史文物, 2003(2): 66-71.

[6] 廖国玉. 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J]. 中医杂志, 1982, 23(4): 71-72.

[7]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72(1): 15-38.

[8] 刘仙菊, 潘远根. 湖湘仲景学说研究概况[J]. 湖南中医杂志, 2009, 25(6): 110-111.

[9]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与沿革:《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之一[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0, 28(5): 924-927.

[10] 陈松长. 湖南简帛的出土与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9(5): 22-27.

[11] 郭文玲.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所见疾疫与医疗文书探论[J]. 文物, 2022(12): 66-73.

[12] 熊益亮. 简帛医学研究述评[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3): 1282-1285.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石门县委员会. 神奇石门: 民俗卷[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275.

[14] 曾勇, 曾晓. 湖南中医源流[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96-197.

[15]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刻本华阳: 宏达堂, 1879(清光绪五年).

[16]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45.

[17] 许盈, 谢雪姣, 申捷, 等. 中医经典文本的价值生成探析[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40(1): 26-28.

[18] 伍新福. 湖南文化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295.

[19] 徐富有. 中国古典文学史科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

[20] 向俊丞. 清代湖湘医著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21]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08.

[22] 陈言.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14.

[23] 温庆新. 古典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2): 228-233.

[24] 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J]. 湖南历史资料, 1959(1): 105.

[25] 寻霖, 龚笃清. 湘人著述表: 一[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559-560.

[26] 寻霖, 龚笃清. 湘人著述表: 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1174.

[27] 寻霖, 田方斌. 湖南文献史略[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0: 478-480.

[28]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220.

[29] 寻霖, 刘志盛. 湖南刻书史略[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290.

[30] 周德生. 湖湘医派[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87.